

9-2013

MCS十周年：遊走於體制內外：文化研究 與成人教育的回顧與前瞻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commons.ln.edu.hk/mcsln>

 Part of the [Crit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2013)。MCS十周年：遊走於體制內外：文化研究與成人教育的回顧與前瞻。文化研究@嶺南，36。檢自：<http://commons.ln.edu.hk/mcsln/vol36/iss1/4/>。

This 文化評論 Criticism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Cultural Studies@Lingnan 文化研究@嶺南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MCS十周年

遊走於體制內外：文化研究與成人教育的回顧與前瞻

第一場：民間辦學與體制邊緣的碩士課程

（關於第一場研討會第一節的內容，可參閱本刊第三十五期）

第二節 體制邊緣的大學課程



面對所謂「國際化」和中國大陸師生的不斷進場，部分大專院校課程甚至被評為變成了只求賺錢的學店。介入本土、帶領變革、回饋社會的大學傳統，似乎已變得不合時宜。然而，仍有一些體制邊緣的大學自資課程，嘗試做點「不合時宜」的工作，局限及困難自然不少，但樂趣與成效也不至全無。這些大學自資碩士課程應如何面對這樣的新形勢？

許寶強：歡迎大家來到第二節討論。在第二節討論完畢後會有第三節對話，是關於民間辦學和建制內容辦學經驗的對話環節，所以希望第一節的講者留下，在下

一節兩位評論員評論過後，參與公開對話。當然，這個邀請包括台下的參與者。這次，我們很高興邀請到三位對辦文化研究碩士課程富有經驗，亦很重要的推動者，包括我們的老朋友——香港中文大學（下簡稱中大）黃慧貞教授。她擔任過文化研究課程的校外考試委員（External Examiner）。而另一位講者則不用介紹，將會是嶺南大學（下簡稱嶺大）協理副校長（學術）及教務長，現任文學院院長，以及過去文化研究系系主任陳清僑教授。還有的是香港大學（下簡稱港大）媒體、文化及創意城市碩士課程的吳俊雄博士。吳俊雄亦是我們的老朋友，亦曾幫我們做諮詢委員會顧問（Advisory Board Members）。第二節研討會主要是討論體制內的教學工作，第一節的幾位講者也提及過，他們均對體制內的文化研究課程有些期望，包括在資源上以至課程提供的知識生產的內容和方向，現請三位講者稍作回應，以及談談在體制內辦課程的理念、局限和將來路向。

吳俊雄：從第一節的討論中，也有很多刺激思想的地方。我今天主要想說的只有三點而已，因為這節的題目是「在體制邊緣辦碩士課程」，我嘗試將以下的論述分為三段：一是體制，二是邊緣，三是碩士課程。今年是嶺大文化研究碩士課程（Master of Cultural Studies, 下簡稱 MCS）十周年，而港大今年則辦了媒體、文化及創意城市碩士課程（下簡稱 MCCC），零周年，剛剛開學。當中籌備和商討的過程，令我和同工在體制、邊緣、辦學、社會等概念，均有些衝擊。

首先是體制。人們很容易有一個錯覺，就是體制和民間是對立的。體制就是精英、中產階級，是一個生產官僚的地方；民間則是知識，或另外一些衝動的泉源，但我相信各位也不會用這種簡單的二分法來界定體制和民間，因為體制並非一刀切的東西。我在一九七七年進入港大，一直至今，以前是讀書，現在是教書。我的人生便是在體制裏度過，所以我對於體制的態度是仁慈的，我覺得在體制下做事是不錯的。第一節蘇耀昌提到大學是香港的寶藏，我很贊成這個說法。資源是寶

藏，知識也是寶藏，但這個寶藏有很多關卡和門禁，我們要衝破很多東西才能達到這寶藏。我辦 MCCC 時，便是拿了在大學三、四十年間的體會去辦這個課程。舉例說，我在一九七七年初入港大時，當時的確用了簡單的二分法來界定港大是一個怎麼樣的地方，很多前輩對我說，這裏不是一個好地方。例如馮可強那篇經典文章，說港大要為中國而立，但出發點卻是港英殖民政府如何對付為中國而建立的一所殖民地大學，所以港大誕生的首要任務，一是要阻礙中國現代化，二是為香港培育一批技術官僚，接任政府官員，使華人可在殖民地時期領導香港。當我加入港大後，我便執著於馮可強這篇文章再三反覆細讀，然後坐在課堂上望著那些老師，暗想：「這就是殖民地走狗，那個便是殖民地的官員。」但我慢慢發現這種想法是有問題的。當時我看著那些準備畢業後當政府官員的同學已經穿西裝、挽公事包上學，我很仇視這些同學，但慢慢發現這種想法也是有問題的。慢慢發現體制雖為監察中國而立，為建立殖民地統治而立，但當中確實有可取之處，在往後能受用。首先，港大著重技僚訓練，缺點是使學生不會獨立思考，只會想可用甚麼技術方法去解決事性；優點是在港大出身的工程師，真的懂得工程。當我遇到法律問題時，會找以前讀法律的同學幫忙。港大訓練出來的社工是仁心的，他們真的像一個人。這些就是殖民地大學裏，一個好的傳統，雖則技僚但有水準，此為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港大要求同學要有洞察力，例如將來當政府官員，一定要對世界有所認識，於是那些右派的老師會著同學多讀一些海耶克的書。但當同學看海耶克看得悶時，會在圖書館找一本馬克思的書來看。讀海耶克後，讀馬克思；讀過馬克思的書，他們發覺自己往後做人的路向會轉變。雖然同學們的目標是當政府官員，但他們心裏會有根刺，認為資本主義、上層建築、經濟基礎這些東西是一條刺。我有不少同學做了政府官員後，通常也會談回馬克思思想。這也是港大的傳統，訓練了一群矛盾的文人。

第三點是港大擁有一個很自由的環境。過去三十年，我在港大讀書、選科、開科，從未遇過關卡。我們辦的其中一科要談性別與社會（gender and society），亦無人提出異議。雖然這是超級冷門的科目，第一年只有六位同學報讀，第二年升至八位，但部門無人阻止，學校無人會說談女性主義是浪費時間。因此，在港大的體制內做事，除了資源豐富外，它有一種英式殖民教育的兩面性，那種優良傳統便是有質素的技僚訓練，同學們有獨立思考力，讓你在大海中自己尋找收獲，你可以找到關於左派的、右派的、齊澤的，或是一些心理分析，所有東西都在學海裏。港大是一個很大的體制，特別近年很多評審（如 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下簡稱 RAE）出現。雖然如此，體制裏依然有很多不同的罅隙，所以大學並非一塊鐵板。

再說邊緣，體制內有很多不同的邊緣。這種想法對我辦這個碩士課程的影響很大。我們在港大辦了一個新式的碩士課程，這個課程談新媒體、文化和創意城市，要談這些東西可從右派或左派角度出發，或者憑認為當時香港需要甚麼而去設計某種課程。但在港大的體制裏，辦課程要過一些關卡，例如怎樣保留好的傳統，以及避談近年一些因全球化、國際化的壓力而產生的不好的傳統。整個課程雖然是剛剛誕生，其實籌備過程與你們 MCS 一樣長。我回看那些設計課程的檔案文件，第一版草稿是二零零三年的，不禁會想到底我們是怎樣推出這個碩士課程？為何籌備了十年之久？原因很多，壞的不談，其中一個原因是錢。

港大始終是一處談錢的地方，所謂邊緣的情況是這種自負盈虧的碩士課程在體制內是個異類，雖然若果今時今日沒有這些自負盈虧的碩士課程，很多大學也要倒閉，但這些課程應怎樣收費呢？我們應把學費定為八萬四千還是十二萬六千元？我們為此爭拗了很長時間。這是體制裏一些奇怪的東西。因此，經驗告訴我錢是

很重要的問題，體制裏會花很長時間處理費用問題。第二，這個不是正規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英文簡稱 UGC）的課程，學校會特別關注課程的水準。我們要經過很多關卡，通過學院小組的審核，還要通過中央共四個層次的檢討。每一層檢討所提出的問題也相當尖銳，也是有關學術問題的討論。第三層的檢討已經到達校長的層面，記得當時校長率先發言，問了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他問我們這個課程的簡寫是 MCC，你們知道 MCC 有甚麼含意嗎？糟糕！校長出了這個難題，怎麼辦？幸好，當時有一個更富經驗的朋友呂大樂在場，他說：「不好意思！我們會將之改成 MCCC。」MCC 在我這一代人來說，應該十分清楚，是代表糊塗的意思。辦一個碩士課程，英文簡寫竟然有糊塗的意思，是否要為港大幫倒忙呢？因此這課程的簡稱最後改為 MCCC。當然，剛才只是說笑而已，除了簡稱以外，檢討過程中真的有問我們為何談創意產業而不談創意城市，產業在城市裏發生，那這裏號稱社會學系，為何不多談整個城市的事。因此，我們本來談的創意產業，變了後來談創意城市。當中的關卡都旨在要令課程符合大學那種技僚化、專業化和有思想性的標準。

通過內容水準的審核後，高層便說：「你們接著要怎樣辦課程，是你們自己的事，你們照著做吧。」那我們就持著那幾項標準來辦這個碩士課程。

剛才我聽劉健芝說天安門民主大學的背景才得知，原來那時陳清僑駕車已是那麼了得，原來你們在二十多年前已經走在一起，可謂是相識於微。MCS 這群創辦人相識多年，眉來眼去，對於八九六四是甚麼事，關心的是甚麼，大家都有默契。而港大的團隊並非如此，不能說是烏合之眾，可說是一群很有才華，但背景各異的人走在一起，有外國人、有中國人、有半中國的香港人。我們想有港大那種技僚、專業的傳統，但另一方面又想回應社會，那究竟這件事將會是怎樣的呢？現在還不知道。我最近為推出 MCCC 而辦了一個資訊日，大概有在場這麼多的聽

眾。當日我很感動，我有兩個同僚在旁，呂大樂和江紹祺，我們事先沒有協調過如何介紹課程內容，但說起上來又似模似樣。那講座大概說了三大重點：一、這個課程真的是談錢的，沒錢就不要來讀了，這是今天體制的現實。我們的課程對比黃慧貞的課程，對比陳清僑的課程，確實是十分便宜。所以，大家想讀的話，學費港幣八萬四千元，共兩年，保證畢業。大家都知道體制的事，但大家都希望在體制內做得最好。因此，這課程很著重分析，這是一個社會學課程。這個課程為何籌劃了十年之久，部分原因是我們舉棋不定，過去十年香港發生太多事。最初，課程第一版是回應西九；第二版是回應二零零三年七一遊行；第三版是回應天星皇后事件；第四版是回應本土行動等等，在每一版裏，有一些會多些建築保育的內容，有些會多些文化遺產和集體回憶的討論，把非常多不同的東西放在一起。最後一版則依著我們這群「雜牌軍」來定，自己懂甚麼就談甚麼。我們不懂建築，就不談建築；我們有人很精通性別研究，便談談性別，希望把一堆熟識的東西做得最好。我今天答應同學，如果你讀這個課程，你將會懂得很多關於媒體、文化、創意城市最新和準確的社會學分析，而且裏面有很多實證資料、研究等的東西。其實港大最關心的主要兩件事是錢，不要太貴；內容，它不關心我們是否關心社會，但無論如果要有一定的水準。資訊日那天我感動的原因是因為我身邊的同事，很少談錢，多談課程內容。來就讀的同學，他們必須參與我們其中的計劃，他們要與校外機構，例如基層大學、獨立媒體等聯手做一個研究出來。這個研究通常是校外機構出題，例如獨立媒體很想知道如何能防止網絡入侵，這位同學便要研究防止網絡入侵的工具，或者他們想研究現在的新媒體較它更新的時候，獨立媒體還可以有甚麼角色，我們希望同學可以一起研究這些東西。剛才提過如何令 MCCC 融入現實，我們是就在課程內容上，透過實習的機會來達到目標。另外，我們設了一間名叫七零二的密室，一間比這裏還要大的房間，就讓同學任意想像：當你要為 MCCC 裏的內容做一個展覽，要與社區有聯繫的東西，你會怎樣做到「裏應外合」？如在房內放一個裝置，在深水埗放一個視像鏡頭，令兩

個地方可以聯繫上來。這個課程不只是讀書，還可以出外做事，也將七零二密室跟公共空間扯上關係。我覺得港大有很多發展空間，但只有獨自行事是不足的，一定要與不同的校外團體聯手，才能辦到這些特別的東西。

許寶強：多謝吳俊雄的分享。第二位是陳清僑。他是第一屆文研碩士 MCS 課程主任。

陳清僑：大家好！正如吳俊雄所說，我們 MCS 的同事們好像有點默契，所以平日很少談這些東西，大家都明白了，很多問題上都心有靈犀。所以我都不太知道應該從何說起，因為每日我們都在處理這些問題。但我也明白，很多同學或其他朋友，未必有機會知曉我們的情況。事實上，我的思考不太有事前組織，但希望在此對一直以來的討論作些回應和交流。首先想回應的是港大，接著是回應序言書室。我同意吳俊雄對港大的分析。我在港大讀書的時候，當時當然還未有序言書室，當時我常逛書屋，把大學資助的錢全都拿去買書，又常常缺席課堂，所以直到現在都可以說是對這個機構沒甚麼感情。當然，我不憎恨它。我有我憎恨的機構，現在先不說這個。

現先回應一下序言書室。在我在港大讀碩士課程的時候，青文書店是我最愛逛的書屋之一。可以這樣說，自從青文、曙光等書店結業後，我沒有再逛書店了。原因是整個環境改變了，自己的生理狀態也改變了。在學校有圖書館，在網上有 Amazon.com，那便不太需要再去逛書局、書屋。因此，我覺得序言書室的出現，對香港是個特別好的消息。

如吳俊雄所說，港大自資碩士課程的籌辦過程，其實和我們 MCS 一樣那麼久。MCS 的課程是二零零三年開辦，即是在二零零三年前數年便開始籌劃，隨著整

個體制環境和香港整體環境的改變，我相信若在現時才開辦這課程，會較吳俊雄剛才提到的情況變得更加複雜和微妙。我想說的是，在嶺大成立文化研究碩士課程，大概全因為這裏有文化研究系，有本科課程，可作為碩士課程的基礎。我們在一九九九年開始本科課程，三、四年後成立了 MCS。在二零零三年，那時高等教育的環境較現在好，那時三三四教改還未成為公共議程之一，所以我們推出 MCS 這課程時，沒太多人注意。當然校內都有人注意到這是 MCS，不是文學碩士（下簡稱 MA）課程。說實在，課程的英文簡稱為 MCS 沒有特別原因，叫 MA 也沒甚麼大不了，但我們內部是有點眉來眼去，有點想突顯它與其他碩士課程有所不同，所以把它名為 MCS。我們當時用一個相對較快的時間將課程推出來。我還記得，很多同事都一直在嶺大教書，從這個角度來說，這個課程已經老化，來來去去都是那幾位老師在教；但從另一角度而言，我記得每年都會任教一科 MCS 的主科課程，而在第一年教的時候，即二零零三，好像是星期六，也試過在星期二晚，這是我每星期期待的工作。即是我每星期其餘的六天半裏所承受的，就是為了星期六下午，或者星期二晚的課，原因是甚麼呢？其實與學院體制的邊緣也有關係。嶺大始終不是港大，大家想想，一九九九年嶺大才正名，好像只是一兩年前的事。那時先爭取加入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以後便萬劫不復了，直至最近一、兩年的副學士事件才到爆發點，稍後有機會再談。這些都是制度上的自資課程，與整體香港高等教育發展策略，及其造就出來的環境有很大的關係。但在二零零三年時，我和許寶強等都寫過文章，討論過文化研究在香港，那段時期，究竟想做些甚麼？做過甚麼東西？我曾經有個看法，我們由批判這個議題，漸漸碰到一大堆難關，就是怎樣教批判，怎樣學批判，以至以後把更多焦點放在教與學的問題上。

讓我再說得顯淺一點，我想在嶺大教文化研究，與在港大教文化研究，是截然不同的事。我們以第一身，由本科課程中看到和學到這東西，因此我用這東西

來解釋，我每個星期都期盼上 MCS 學生的課，因為這些學生思想也算是正常，有一定的工作和社會經驗，知道自己做到甚麼，有一定的能力去做些甚麼。當然，十年以來，雖然我沒有做過調查，但也看到學生平均年齡下降。在最早期，學生平均的工作工齡，好像也有五至十年，是相當豐富的，現在卻有很多當屆的畢業生入學。過去三、四年，我們內部討論要不要將這個課程由兼讀制，變成同時有全日制的課程，當中其中一個考慮，都是關於我們會吸引到甚麼學生。這點我們思考了很多年，而我們終於在今年嘗試開辦全日制的碩士課程，但還未敢全面開辦。

我想再提一提，就是可能於其他體制，例如在香港以外而又在體制裏的朋友來說，會不太明白，但在香港內部的人，又是否全部都明白呢？即是說，對於自資課程，為何政府，又或者教育資助委員會，會略略放鬆政策，鼓勵你們去辦這些課程呢？其中一個根本因素，就是他們從一開始對整個高等教育的投資、承擔，以至對整體教育的投資、承擔，都拒絕投放。這情況在香港高等教育中尤其嚴重。在最早期，我想有些朋友可能記得有些副學士課程是受政府資助。開始轉制時，政府逐漸以至到現在已完全不資助這些授課式的碩士課程，令整個環境帶來很大的衝擊。

我想把這問題帶回學系，以及對大學有甚麼影響。如果大學有一定規模，或者學院或學科有一定的課程數量，又或者學系人員和老師人數較充裕時，調動往往比較容易一些。當然，對於很多學系或碩士課程來說，賺錢是很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原因。我很坦白地承認，賺錢於我們來說不是不重要，因為要多賺一些資源，我們才可以在不拮据的情況下，有多一些空間做事。雖然學費大部分都要上繳校方，但我們亦希望盡量爭取更多空間去發展，令同事們可以兼備教學、研究以至其他範疇。坦白說，當初沒有甚麼壓力逼使我們辦自資課程，也沒有人叫我們去

辦，反而是我們認為需要開辦文化研究碩士課程，於是便立刻行動，因為我們想先發制人，讓我們有更多空間做事。至少在開首五年，情況的確如此。

剛才談過本人自身的教學經驗，其他同事可以再分享。坦白說，到了今時今日，雖然已不再像一開始時那麼期待星期六的課堂，但每一課我也是極之享受和充份地投入的。我也希望同樣的事可發生在本科的教學裏。回到教學上的問題，剛才有朋友提到大學的資源，文化研究這學科或課程能否提供一些解決方案、理論或方向？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是不達標的。坦白說，學生、教員來自不同的地方，課程不能為生存而只選收某類同學。MCS 學生的職業範圍很廣，有教師，亦有從事與非政府組織相關工作，而且最近越來越多同學是參與文化界、創作、出版或文字工作。雖然我學生們的背景相異，但卻可能有共同想法。如剛才馬國明提到，他們可能對香港時局，或者對自己身處的工作環境等，感到困惑，他們希望在此找到空間去處理這些問題，而我們也是這樣想的。我們在體制當中教學，並非不用心及不關心學生的情況，但的而且確，我們所面對的學生，他們的條件和情況很不同，年齡亦很不同，這方面對我和其他同事來說，在這幾年對教學和教育的問題掌握得更多，這亦變成文化研究中的主要關注點。這些會連繫到許寶強設計的這兩節論壇，八月三十一日也有一場研討會，都是關於成人教育，正規教育以外，邊緣的課程的狀況。

香港一直談終身教育。最近教育資助委員會做了一些很奇怪的事。他們一方面回應整個社會對政府運用公帑的關注，如剛才已提過的教育投放資源方面，會設有一定程度的限制。但在落實執行時，還需要重新評核大學的研究水平。事情不難理解，政府想運用同數目的金額，投放資助在較能做出好研究成果的大學上，所以就在資源調配上花了些功夫，在執行前仍需再次評審，那便是剛才所說的 RAE。另一方面，又因為要回應社會很多的批評，特別是對大學的批評，例如只著重研

究而不做好教育等，所以政府又要找一套機制去評估各院校的教學成果。其實一直以來，大學資助委員會放在各大學的資金，有百分之七十五是根據學生人數而投放，所以可以說是「做又三十六，不做又三十六」。試想若果以學生的數量作投放多少資源的準則，那應怎樣處理當兩所大學有相同數量的學生，到底是甲大學還是乙大學的學生較優秀的問題？既然學生數量相同，投放的金錢也應相同，充其量只會因為醫科要買儀器而會被分配多些資源而已。

接著是資源方面，由於副學士的問題，出現了很多令社會關注的情況。以政府的角度來看當然是因為大學監管不力那應該怎樣？那就再監管多些吧！多些監管，除了指採取評估機制之外，還有的當然是香港政府的強項，調查湯顯明也是這樣做，便是透過帳目委員會調查帳目來調查大學。這個情況使嶺大受很大的衝擊，指的是那些非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課程，例如 MCS。如果每條帳目逐一調查，例如假設現在許寶強或羅永生坐下來，便要調查他們的薪金中有多少百分比是來自文化研究的？多少是來自公帑資助的？如果你在辦一個自資的課程，那局方便會找你查核帳目。大家可以想像到，要從這個脈絡出發，迴響將會非常之大，還會涉及龐大的行政費用。

但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思路就是這樣，自資課程有兩大困難。第一，如果你不是想利用課程去賺錢的話，就不知為何要辦課程。等於我同樣會問嶺大當局，為何要辦副學士呢？是想賺錢，還是想服務社會，還是其他？若要計算成本，計算資源時，很多時候很多例子都告訴我們，人的資源、時間、精力，或者由人建立的體制的可持續性，是難以計算的。

許寶強：非常感謝陳清僑的發言，以下請中大黃慧貞談談她的經驗。

黃慧貞：自資和非自資的比例我們算得很清楚，一早有了數據。我非常喜歡今天的題目，就是體制邊緣與大學課程，因為中大的文化研究的成立，正如我剛剛提到的是陳清僑也參了一腳弄出來的東西。由開始到現在仍處於體制邊緣，無論報讀人數有多少、收生成績有多好、經常做那些「長檢」（Full Review）或「短檢」（Light Review）然後課程一再被肯定，但總之文研在中大就是一科可有可無的科目。甚至在過去十年——因為來年將迎接中大文化研究的第十年——我們還不是一個系，只是一個課程，十年來資源一點都沒有增加，那我們老師要怎樣、發展要怎樣、開課要怎樣呢？事實上，我們得以發展是基於我們的文學碩士（下以英文簡稱為 MA）課程，所以情況和陳清僑所說的正好相反，你們是以本科課程作為基礎，跟我們的情況恰好相反。我們的文學學士（下以英文簡稱為 BA）課程能維持下去，其實是靠 MA 支援的，所以各位也說得很對，沒錢怎麼辦呢？錢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有趣的是我也有類似的感受：有一位大學高層曾經指出為甚麼中大不應辦文化研究的本科課程。因為十多歲的年輕人怎會懂甚麼是意識形態？那是在教壞他們，所以不應該有這些課程。無可否認的是大家在教 MA 同學時是一種截然不同的經驗，在座也有中大文研 BA 的畢業生，但那位是相對成熟的同學。MA 同學對於意識形態批判、文化批判與文化霸權批判這些理論，同學的反應很快到位，特別是課程早期的同學都具一定工作經驗。對他們而言，有很多討論會讓他們亢奮，可以批判、看見社會的問題等等。現在回顧中大 MA 課程的情況，原來已經歷了十四年，由一九九九年開始。

最初的情況很不錯，因為沒有甚麼「終身學習」、「通識教育」等口號，來報讀的朋友都是有心人，幾乎是一次再次學習的經驗，因為第一次選科時限制於出路以及對親朋戚友的交待諸如此類的因素，令人不會選擇文科或不知在幹甚麼的科目。所以在二零零零年左右入學的學生，有些是已經讀了好幾年商科，但感覺厭倦，然後來到我們這課程，找到新的世界、新的意義，一個可以開展不同想法的地方。

所以當時的同學都非常好學，非常容易引起共鳴，也很明白文化理論對社會的種種批判、道理在何，為何要課程名稱這麼「古怪」等等。不過經過了十四年，我們的課程也有了很大的變化，由最初每年收取五十多個申請，到最近一次申請人數升至七百多人而我們則收取大概十分之一的學生，即約八十人。其中有很多變化，最少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來回顧一下：第一階段是剛剛提到的最初五年，都是些有心尋找在本科時錯失了修讀有興趣科目機會的朋友回來唸書。我稱之為第一階段，是因為自己想要讀書，不為甚麼或不為別人而讀；第二階段就與通識課程的出現有關，想起來，這階段的同學有一半是中學老師。大家都知道通識教育出現時大家都不知道它是甚麼，連教的老師也不知道，我們教育學院的同事就苦苦思索設計課程，大家都摸不着它的底蘊，所以教育學院的課程就在教學法的科目基礎上，加上通識的東西再稍為調整一下就是。當時，有很多老師都想藉着我們的 MA 課程去學習通識是甚麼，選修一些文化、媒體與大眾意識的課，又如全球化是甚麼，嘗試找到幫助。而 MA 課程的確會對此起到幫助，因為它會訓練對社會現象的一些思考，對全球經濟以及文化現象作出一些深入的分析等等。但簡單來說我們只是用口說，只是在講台上說些大理念、大說法，但我們不懂得教，因為像剛才提到的問題一樣，「教」涉及了另外一些理念。所以如今回顧，某程度上在這個階段我們可以做到的至為有限，因為我們幫助不了通識教師走到前線教學，充其量是提供這些議題，就此有些推進以及提出一些想法。這些中學教師同學上課非常辛苦，我特別讓他們可以在課堂上進食，甚至將課堂延遲十五分鐘才正式開課，讓他們歇歇，因為他們都是下了班趕來上課的。即便如此，同學在坐上半小時後便開始昏昏欲睡，因為工作實在太辛苦。我認為這階段時間是課程發展中教與學中最令人不滿意的一部分，因為他們也得不到最需要的東西，我們也不是職業教學訓練的課程，所以現在來讀的中學老師又少了，況且現在有許多打正通識名號的 MA 或 BA 課程，結果我們少了許多這類學生。

第三階段是最近的，就是過去三年，一個我也不知道為甚麼要實施，但已在靜悄悄地發生的人口政策，來港讀書的同學，尤其是內地同學，唸完一個課程後可以留港一年，不須任何工作或條件。相信因為這項政策吸引了許多人來報名，剛才我已經提過每年申請人數直線上升，由此亦牽動了課程上的許多改變。第一是過去以兼讀的同學為主，其中多具備一些工作經驗，部分是教書的，但現在報讀的大多是應屆畢業生，他們剛剛完成了 BA 課程，多是全職學生，而內地的學生佔的比例相當大，值得注意的是內地同學必須是全職學生才能取得學生簽證。在二零零零年初時，我們也嘗試就國內收生進行過討論，當時我們堅持以廣東話上課，因為課程內容具備一定的本土性。但在過去的幾年，我們也在轉變，加入了一些英語與普通話科目，也加入了一些操普通話或英語的同事。由於整個教授對象都變了，課程由最初的十四科——其中只要修讀八個科目便能畢業，因此十四科已經提供了很好的選擇，但現在則增開至二十科，其中加入了如中國社會及文化、一些特別是近年越來越重要的社會運動如酷兒運動、網絡文化運動等等的課。

中大的氣候很怪，我們不是殖民地大學，本來理應是抵禦殖民地霸權的大學，但我們卻似乎承繼 “the worst of both worlds”，就是同時兼具中國最壞的地方和殖民地的官僚主義。所以無論我們的課程辦得多出色，但我們收到的訊息還是：「最好不要辦」。今天我們面對的困難包括了幾點：第一是增加學費，這是逼著我們做的，每年均不可以低於某一水平。接著是提高課程檢討的密度，變成差不多是每年一檢。我們本科的全職老師其實很少，正如剛才說的，我們的 BA 課程其實靠 MA 支援，箇中原由是校方設定了 BA 的學生收生數目上限，年年都不會增加，由此而來的資源非常有限。所以要開辦 MA 課程，我們需要借助兼職老師的幫忙，馬國明老師打從一開始就幫我們授課，即是有些非常優秀專業的兼職老師，我們借助他們的力量去辦好這個課程。但去年政策突然改變，課程不可擁有多於百分之五十的兼職老師，必須以全職老師為主，當中更指定要教授級別（professorial

grade) 為主，這就便出現了新的問題、新的挑戰。總而言之，校方傳達的訊息就是辦不來便不要辦，意思是你最好不要辦，箇中原因非常複雜，有機會再談。

無論如何許寶強著我們談的是體制內的機遇，不只是談困難，剛才我可能特別著重了困難的部分。機遇倒不是沒有的，最初大學不知道如何處理一個 MA 課程，由最初放任不管，到現在管得很緊，但由於我們始終是自資課程，在很多地方某程度上校方都容許我們做多一點，後來可以發展得多一點。最初的時候談性與性別、電影與媒體、大眾媒體這些課對於大學管理人員來說都是些不入流，難登大雅之堂的課，但校方不管我們，所以我們就開辦了，中大是其中一個最早能夠開辦這些課程的地方。

所以現在回顧當時，我們有意無意地使用了這個「錯置」的空間，其實也發展了課程的個性，這可以分三點來說。第一、很多討論會形容非傳統教育是正規教育的補充、一個補遺 (supplement)。但補遺這詞大家從讀 Derrida 便知道十分重要，除了指出現存制度的匱乏外，更指出那個地方非常豐富，增添了很多應該有的事物。在這個我們尚能辦下去的空間來說，我認為我們是在發揮這個作用：一個補遺，這是非常有意義的。因為它做了一件事，就如我剛才所說，為何中大現在認為自資課程可有可無呢？最近聽一位高層行政人員說 MA 課程開始出現濫收情況，所謂濫收即是錄取一些二三線大學的學生。他這個說法其實針對國內生，因為內地有分一些「二一一工程」、「九八五工程」，我都弄不清楚有多少數字，那些是國內比較好的所謂「名牌」大學。但許多 MA 自資課程會收一些不是「二一一工程」的學生，所以令中大的學位貶值了，這就是這位同事關心的事。但 MA 作為處於體制邊緣的課程，我認為這正正是它最成功的一點。大家知道通過正規考試篩選的是某一類學生，但文化研究針對的可能卻非這一類學生，不是說成績好的同學不適合入讀，我們也有很高成績的同學，意思是我們不是某一類學生才

能受益，我認為這是非正規教育的特色，就是不同年齡群、教育程度、背景的朋友都能在這裡發掘一個相對開放及所謂「無障礙」的環境與空間，這是我們所珍惜，也能辦到的一點。

第二、是專業支援。剛才也提過通識教師不知道讀甚麼、教甚麼才好，有些情況是有些同學告訴我們自己被編配去設計通識課程，但他們卻完全沒有頭緒。這方面我們其實提供了支援，我們的課程名稱明明是叫文化研究碩士課程，也特別加上關於通識科的字眼（Liberal Study Stream），讓他們的成績表看起來專業些，但這始終是我們感到最為無力的一點，我們實在做不了甚麼。另一個問題是談今天的大題目——成人教育，我們會經常思考成人教育的性質到底是甚麼？一種職業進修？還是可以思考人生的地方？最容易的答案當然是要平衡兩者，提供多元選擇，各取所需，但卻沒有回應同學在職場遇到的許多直接問題。有理想、受感召的到了職場可能會碰到許多釘子；另一種則可能進不了建制，處於體制邊緣，在理想與現實間不停衝突。我有時也會想嶺大的課程比較上好像做得多一點，因為中大是相對無力的，這方面做不了太多，這就是在體制底下空間的限制，也不曉得怎麼說才好。

第三、我看了一本很有趣的書，書名是“Learning at The Back Door”，就是「走後門」的學習，我很喜歡這個概念，雖然剛剛提到的那位高層同事正正就是用這個詞，說 MA 的自資課程就變成了同學們走後門的途徑。這個說法反映出的當然是一種對於精英主義的想法，這位同事雖然說的是我們對於內地同學的標準越趨寬鬆，但我們一直的錄取方法也沒變，反正只要符合中大的標準，不管你是來自甚麼院校，我們都一視同仁，我認為這正好是「走後門的地方」，而未來的我們都會秉持這樣的性格。這本書也提到大部分人忽略了成年教育，學員的特徵包括他們想讀書，無論是因為職業上的需要還是單純的興趣，也是想讀書的，那麼學

習的動機就自然會高。他們是最有活力的，因為知道自己想要些甚麼，所以最有能耐，捱得很辛苦是另外一回事，但他們是最有能耐、最有求知慾的，甚至如果給予足夠的空間，他們也是最具創意的，因為他們能注意到理論與生活間的張力，以及那些張力衍生出來的可能性，而且他們的生存能力也很強勁。回頭看這些素質一直被忽略，卻可能是課程最應該珍惜的地方。

最後我想作一個總結，因為許寶強說要展望，那我就嘗試展望一下吧。我覺得既然一開始談邊緣，那可以嘗試多談一點邊際，我不知道這個中文詞語是否最為恰當，但不知大家有沒有留意，我們的課程英文名是“MA in Intercultural Studies”。這個“Intercultural Studies”的課程名稱有它自己的故事，我想陳清僑也應該知道，誕生的過程有點莫名其妙，這裡略去不談。然而因為它的出現，我們的課程創辦人王建元教授——很喜歡使用“Inter”這字，雖然每次大家都聽得一頭霧水，但“Inter”的意思就是不落兩邊、不去歸邊，所以與其認為自己身處體制邊緣，人家看你無可無不可，那麼不辦就不辦吧，不如爭取成為一個「不落邊」的狀態去挑戰既有邊界：為甚麼這些邊界限定了怎樣閱讀、限定了怎樣學習、限定了甚麼叫「前門」、甚麼叫「後門」、甚麼叫「橫門」？這正正是讓我們可以多多質問或詰問的。我們現在的課程多了很多內地同學，其實出現了很多問題，例如語言問題，我們其中一個科目是「香港城市景觀」，老師明明用廣東話上課，難道要用普通話教不成？我們有位老師教粵劇，難道又用普通話教？甚至用英文教？其實這是一些語言、也是文化政治的問題，我覺得現時我們的政策比較混亂，仍在慢慢調整中，但我認為這種混亂亦是一種活力、創造力，為甚麼呢？過去幾年因為多了很多內地同學讓我們不斷地問我們課程的目標是甚麼呢？要不要重新思考呢？又為了甚麼原因值得這樣做呢？是錢的問題嗎？很多人一直認為是錢的問題，當然我們剛剛說錢是一個因素，但回頭看我們其實是在提供一個空間，與同事討論時甚至認為辦文化研究的服務對象可能不應限於香港，而真的需要擴闊我

們自己教學的領域。

我們今年是第三年增收國內同學，一年比一年多，聽見國內同學說得很興奮，讀得很開心，其實可以理解他們的興奮，她說今年讀了一年 MA 課程，學到的較過去四年在國內課程學到的還多。不是說我們課程如何厲害，而是可以聽出他們學到的、受到的刺激與視野的擴闊的確很大。更有趣的地方在於大部分同學都希望畢業後留港工作，這又是另一個問題，就是本土學生與國內學生的競爭和張力等等的問題。然而另一方面他們有些也回到國內去做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簡稱共青團）的工作，或政府部門的工作。有一位同學說回去會當《環球時報》的記者，還有中央電視台。我覺得這是非常有趣的事，不論將來發展如何，如果他們在課程認真真地學習的話，我認為他們都會成為很不一樣的同學，不管回國後到甚麼機構工作，也會帶著一種不同的觀點回國，這也是他們對自己的承諾。所以我認為有趣的地方在於過程不斷地變，我們遇到新的問題、新的環境，不停嘗試一步步去解決，縱使始終都在邊際。這個「邊際」可能就是能讓我們更加靈活，可以貢獻相對地越來越建制、越來越官僚的大學教育的最佳位置。

許寶強：多謝慧貞的分享。我先想帶出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跟馬國明老師的說法有著共同點。剛才的討論裏首先著重的是辦課程時，在課程內容上的思考，到底帶出了甚麼訊息？為了配備這些課程可能需要資源上，譬如金錢、體制行政上的支持等等的思考，到剛才比較多如陳清僑提出的討論教學法，甚麼是教，甚麼是學呢？教育到底是甚麼呢？一個很根本問題的討論，這就是我剛才聽到的一種轉變。那往後教學法會不會成為思考新體制外課程的重點呢？我們待會可以討論。

第二是學院與民間或社區的結合，幾位講者都有提到，甚至是上一場的講者，如蘇耀昌提過的學院資源如何與社區分享，不止在教學上，而是圖書館、知識資訊

上等等。或許所謂的教育過程反而是學院在跑入社區的過程，換言之，可能不是知識份子教育基層，而是基層教育知識份子，這是其中一種對學院社區結合的理解。我一開始辦通識教育研究的時候，也沒有預期序言竟然能捱過六年，這是教育局沒有想過，參與諮詢過程中沒有人去想過序言的生死，也沒人會想過會有八十後社會大學的出現，剛才余振雄提到越來越多學生參與課程，有百多人，或者她們本身就是通識教育的大浪潮裏的一種產物，或者是文化研究的產物。在體制裏辦課程改革，包括中學到大學裏文化研究的課程改革，會產生一個意想不到的社區的效果。剛才吳俊雄提到的那種思考我認為已經很前衛，但他暴露了一個秘密就是那種思考是從二零零三年開始，即已是很前衛，是一個很古老的想法。但從這個既前衛又古老的課程設計中，看不見一早想好如何跟社區結合，他在思考教學法與內容設計，以及課程設計的結合，例如是獨立媒體或社區開題，然後要學生做研究。如果你認識吳俊雄，其實在獨立媒體之前他已經有許多課程是這樣設計的，亦在教學法上思考結合方法。這種結合帶出了一個問題，過去我們有（學院與民間）假對立，但其以慧貞的說法就是互補不足的，可見知識分子辦這些課程有一些憂慮，也要解決自身的問題，文化研究其實是甚麼呢？就是解決體制內知識分子自己碰到的問題，如感覺授課很沉悶，想著要等那個星期六、日下午才見到 MCS 的學生，可見生活多麼痛苦。這一個痛苦的生活問題，所以它是解釋你自身的問題多於解決社區、MCS 學生的問題。

我最後想分享一點，同時也提醒我自己，在辦這個研討會的過程中，我也重看了英國第一代文化研究教育工作者的過程和經驗，越看越豐富，我們過去很多時候談文化研究時會忽略了這些很豐富的經驗，例如第一代 Williams 到 Stuart Hall，全都參與過工人教育，他們都是像蘇耀昌一樣。而其中一個最核心的組織叫 Worker Education Association（下簡稱 WEA），這是兩戰和戰後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人運動，當然與許多體制如劍橋、牛津等等有很大聯繫，有一部分如 Williams

便是從牛津派出做事，所以學院與這些民間組織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這種工人運動十分有趣，當時的歷史脈絡尚未到達馬老師所說俄國十九世紀思想大爆炸的年代，那時剛剛經歷過法西斯、經濟大衰退、各種文明的衰落、兩次大戰等，也真的很抑鬱。那如何可以從這狀態中跳出來呢？這是當時一代知識分子重要的思考題目。當時 WEA 內有個大辯論，分裂成許多派別，後期文化研究那派就批評工會主義、各種前期內容上的設計，認為要多點批判理論，或是國際政治關係。有時當開辦一個課程發現有不足之處時，有些時候並非說理論錯了，而是教學法有問題，那教學法有甚麼問題呢？Williams 等提到過去教育並非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教與學，那學生想要甚麼呢？其實就是剛才問民間是甚麼，民間裏我們談一些工會的組織幹部，他們需要的教育並不相同，可能需要組織工作、法律等等知識；但如果是基層工人與家庭主婦，當時英國成人教育最大的兩批對象便是產業工人與家庭主婦，後期去產業化便轉向一些低收入中產家庭主婦，這種轉法亦使得後期工人教育由國際政治經濟關係、馬克思理論轉向文學，開始教授外國文學，這當時的情感轉變有關。提這些是因為馬老師所說的要放回歷史脈絡轉變裏，判斷這個定律，定律包括民間及其對象是誰、需要的教育與學習是甚麼，如何去學習等。最重要的文化研究學者所處理的都是這些，甚至他們最重要的著作也在書寫學生對象。

最後讓我提出幾個問題，幾位講者可以處理一下。關於前景的問題，如果剛剛的說法成立，那我們就要重新判斷香港的背景：究竟是十九、二十世紀俄國的抑鬱狀況，還是戰後英國走出愁雲慘霧但仍然抑鬱的狀況？學生群是怎樣的？是關注政治經濟，還是像英國家庭主婦一樣關注文化、文藝，由當中抽取一些文化研究的有關課程內容？香港又怎樣呢？未來十年的成人教育、碩士課程的學生對象又是甚麼呢？是中國內地的學生，還是本地的學生？抑或是兩者相關？是基層學生，還是中產的中學教師？這些中學教師是中產還是基層？我們需要判斷也需要討

論。

第二個問題是教育的角色、知識的角色是怎樣的？尤其剛才吃飯時與葉蔭聰談到網上討論再也討論不下去的問題，以前可能在網上被人反駁後會回去找書再反駁，現在不可能，一旦回去找書就可能有一百個、一千個回應把你罵得……所以不懂得玩了不禁問知識的角色是甚麼，以至於教育工作的作用是甚麼。我們認為這是異常嚴峻的問題，我們觀察到教育的轉變除了在知識上、思想上的爆破等等以外，有情感上的爆破也有技藝上的爆破，近來比較流行同學自己辦教育，都不再是馬克思、葛蘭西等等，那關於甚麼呢？例如新界東北導賞、下田耕作一日、做花牌、織毛衣等等，辦的工作坊吸引了不少新一代。除了知識和思想上的未來的前景，課程是不是也要同時觸及這種情感與技藝呢？在這個範疇上是不是我們辦課程或民間辦學的未來方向？我提了這些問題，剩下大約十分鐘的時間，現在三位有沒有甚麼回應？

陳清僑：補充兩點，第一點是關於那個上課的星期六，需要解釋一下，感覺是非常真切的，我仍然對當時每天在教學樓的樓梯走下來的心情印象深刻，心想還有多少天才到星期六呢？但大家不要忘記那時約是二零零二至二零零三年度，當時我們正在建立文化研究學系。建立學系是甚麼意思呢？就是透過建立本科課程去建立學系，當中當然有很多行政工作，但最主要的是教學工作。這一點我就想說，因為兩批的同學大大不同。我們做研究也提到由教學當中引起了理論性的問題，倒過來問其實文化研究是甚麼？這也是我剛才提到的批判到底要如何處理呢？這並非作為教學或理論開始提出，而是在每日實踐的處境中我們去提出、辯論。其實當時星期一至五都在幹這些，為甚麼星期六會不同呢？因為 MCS 學生的確是不同的，反而於我們來說對他們的教學比較接近傳統教學，星期六好像有點思考小爆發，因為那些人好像聽得明白。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屆的 MCS 同學做報

告時，帶了個大提琴進來，做十五分鐘類似 John Cage 那樣的演出，挑戰我們到底會如何回應。這是前所未有的，很具挑戰性。當然本科的同學也有挑戰性，但那是另一種挑戰，要處理的可謂截然不同，即使你同樣想跟他們談 Raymond Williams，但如何教呢？其實我也未曾讀過，但同樣要教，我也是自己在書局裏找書來看的。雖然我讀文學出身，但最喜歡讀的不是小說，而是《馬克思主義文學》，其實是一本寫得非常難懂的書，不可能讓同學讀，但如何講授呢？

剛才我提過與中大、港大的不同，我們嶺大的情況是 MCS 的基礎建立在本科課程之上，所以我們必須維持本科課程的持續性，某程度上你可以叫它 "bread and butter"，事實上兩者的確唇齒相依，所以在我們的情況裏兩者的互動關係很密切。

吳俊雄：我認為剛才許寶強問的問題很難回答，原因是現在世界複雜了不少，為甚麼看第一屆的文化研究這樣刺激呢？對我們有這樣大影響呢？原因是我認為他們在一個相對簡單的世界裏運作，意思是他們對主流的學術思想有很多批評，對民主等等不滿意，於是有一大堆 Stuart Hall 之類的東西跑出來。另外他們對主流的教學體制不滿意，盡頒學位給精英然後上位，她們不愛這種事，所以搞些很激進的思潮，然後在體制外辦工人教育，整件事非常純潔。一旦你認為不是這樣，體制除了頒授學位外也頒授人格，也產生許多其他好的經驗，學院裏面不盡是壞人，也有不少是好人，一旦想回到學院裏做事，便會面臨從思想到機制每日的抉擇，甚麼值得做、甚麼不值得做，剛才發牢騷的三人，是在發這種機制上、處境怎樣抉擇的脾氣。

我認為是有兩堆東西對這群人造成困擾：一堆是當你認為在機制裏面值得做，於是每天都要做，要對付制度、條文之類的東西；另一堆是處理完這些行政後，要真正面對學生，教她們你喜歡的東西，大家可以互相學習等等，我認為這裏沒有一個絕對的答案，因為我們三間院校的情況各異，像陳清僑說中大訓練中文精英、

我們訓練英文精英、你們訓練邊緣的人，儘管不是很準確，但大致上三間院校的背景不同，面對的事也不同，做起事來有很多要處理的事。剛才慧貞提到中大的情況，第一期收生到最近收生人數有變，來源有變，要求亦有所不同，所以談的其實是平台不同、處境不同、要解決的機制不同，我認為只有一樣足以面對上述這些，就是你當自己是個一個技匠（craft worker），就像你今天象牙雕刻，明天能否較昨天把象牙雕得更漂亮？其實教育在體制裏，尤其當教學變成一個如此龐大的官僚體制後，提大原則可能也沒甚麼用，要倒位為技藝，就像梁旭明剛剛問我最近忙甚麼我也答不上來，因為我最近被一課的簡報絆住轉不過去，我教了五年，每每教到那處人們便張大嘴巴，不知我在說甚麼，於是我就花了五天解決那個轉折點。不管是甚麼類型的教學，如會計、規條、設計課程，很多時候是談一種技藝，該如何轉好一個彎位，更多時候值得提的是那種技藝的經驗，到底是否有把細節做好，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我很喜歡慧貞剛才說邊際一詞，到底如何才能令文化研究有學術內涵，也能觸動人心、影響思潮？很大多東西是不能單幹的，應是一個單位、社會學系、文化研究系去解決這件事，其實目前很多都在靠「邊際」合作或完成。今天好像沒有談到大學的通識部，通識部其實在進行很多文化研究時，沒有文化研究或社會學系的束縛，因為它開宗明義讓人破格，醫科生不能只懂醫科，要多認識其他，所以整個設計已經要求大家「破」、走遠一點。當然通識部有自己的限制，但所謂 inter 就是文化研究系、社會學系、通識系一同思考如何將這件事由校外傳出去。

另外一點是想說學院與學院、基層大學與序言書局如何跟 MCS 及各社會學系在某些場合一同做些事，一同推進的想法。我不認為馬老闆提到俄國十九世紀的社會即將到臨，香港社會不像會有這種大型爆發，反而屬遍地開小花的狀態，就是

民間有一堆七年便倒閉的機構，然後變身成另一家新機構，體制內有捱了十四年的學部，轉型成七、八年，但好像不怎麼高興，是這種狀態。其實遍地都有事進行中。若能好好進行技藝與邊際的合作，可能便會長命一點。

許寶強：慧貞有沒有補充？

黃慧貞：沒甚麼補充，十分同意。基本上當老師就是這樣一回事，就算體制改得如何面目全非、非人化也好，但當你面對同學，其學習熱情、對知識的追求、在課室內你教，然後他的反應、經驗與分享這種互動，我認為這是對於教學非常重要的事，所以我同意教學法上有許多值得開拓的地方，我也不知道有多少空間，但這是應該去探求的。我認為吳俊雄的想法非常有意思，值得深思。但觀乎中大的情況，實踐最少的是我們仍然談著非主流的事，從而給予同學一個空間細想原來可以有所不同的。有一個說法是不怕實踐不了烏托邦，最怕連烏托邦的想像也沒有，我認為這是我們現在的堅持。

許寶強：由於時間關係，我現在將時間交給葉蔭聰與羅永生作一個總結評論。

第三節 體制內外的對話



羅永生：今次的研討會提供了很多機會讓大家發表意見，而這次研討會沒有答問環節，是很新的設計，全部的討論都集中在最後環節，我想這構思是希望討論能較集中一點，避免分散在枝節上，在最後能針對剛才不少嘉賓的發言重新提起對話，所以我將簡單地分享自己的看法作為討論的引子。

今天的討論一方面回顧了民間大學的歷史，不單有烏托邦的想像，亦見懷舊情緒和未能滿足的理想等等，時光倒流般進行了一次體制內外，與我們自己人生經驗裏不同階段的交流。好像剛才黃慧貞提到的“inter”，一種非刻意區分體制內外的對話，而是自身對自我的“inter”。我認為從簡單的觀念出發，由我們廿多歲起開始受左翼理論及文化研究啟迪思考，以及如何回應問題開始，到了今天所經歷的問題已猶如滄海桑田，面貌全非了。第一節劉健芝與蘇耀昌所提到的問題，都是從二十年前經過無數掙扎，一直延續至今的觀念與理想，另外兩位辦序言書室和八十後社會大學的朋友談的則是非常現代的問題，是對「當下」的理解，其實就今天的論題「體制」而言，我認為從大家的對話中，可見「體制」於各位意義並非相同，如果大家認為文化研究的傳統就是非體制／反體制／在體制邊緣／抗拒體制，那待會大家可以集中討論對自己來說甚麼才是體制呢？以前的體制若然是強權壓制，我們又靠甚麼應付它呢？如果文化研究開辦碩士課程也算是反體制的話，那我們須自我理解它的力量為何得以發展，又或這些反體制的聲音如何存在，其中一個不能不面對的情況是縱觀過去十多年來，院校的課程均在回應市場。當學問變成文憑，文憑變成資歷，而資歷可以引出體制內的資源並供人們選擇時，那我們所面對的問題當然不像基層勞工那樣簡單，而是帶出更宏觀的問題，例如甚麼是求學？甚麼是學生？甚麼是成年學生？在這樣的轉變過程中，其中不能不面對的是我們的課程實在是因市場而變化，說白了就是在新自由主義底下的教育理念下給予人們選擇，然後在市場上養成一種體制，再衍生出一個問題是到底市場是不是體制？我們正處身於一個漫無頭緒的體制，一個邊陲的位置。

另一點則是成人教育，如果我們辦研討會、課程時，需使用這一套語言，而這套語言在所謂教育體制下是可以被接受的話語，一是職訓，二是人民精神。但這兩套話語都不是我們今天的話題。今天在談的是社會介入。所以我們身處在交叉點上：如何能夠說服別人對職訓與人民精神兼容並包？而社會介入則藏身於兩者之間得以提及，這套話語的操作亦非我們二十年前辦天安門民主大學時考慮所及。

「體制」的意義固然不停更迭，「民間」亦然，若以往我們認為在統治階級底下的便是「民間」，便是反抗的力量，到今天若問八十後社會大學的朋友，「民間」又變成了缺乏反思、處於反智文化下的公眾。這就是我們要處置的問題：「民間」到底是保證我們熱情的來源還是要與之拼死對抗？我們從中得知歷史已經進到另一個全新的環境裏，運動亦因此有了新的觀念，以前是充分闡釋(well-defined)、被壓逼的階層，但如今在實踐上究竟還是不是面對著同樣情況呢？以往利用學院資源聚眾組織、訓練實戰技巧，若果要冠上人民精神之名，那又是甚麼呢？有時候我們為了闡述這事會用上許多貴族式的語言，先有「人民精神」然後有「社會介入」，而「社會介入」又是甚麼呢？因為屬於另外一個範疇現便不詳細說明了。我們處於一個夾縫之中，希望待會的討論能帶出自己如何看待體制，無論是從第一節民間大學的角度看體制，還是剛才一直回顧文化研究的演化歷史這如此古老的記憶，檢視了體制裏的苦悶和矛盾心情後，到底你對體制有何看法或思考呢？

葉蔭聰：我聽了整個下午，討論的問題似乎都在圍繞民間及體制，雖說民間也不全是非體制，不過這裏的體制似乎主要所指的是大學。以個人經驗而言，我認為兩者最主要的分別未必是在於階級問題，不是說民間屬於基層；體制屬於精英，依據我在嶺大的教學經驗，事實上很多同學都來自基層家庭，且比例很高。我認為最大的分別是自稱進行教育的人，如何想像被認為接受教育的人，簡而言之，就是執教的人對學生的想像。在研討會的第一節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包括蘇耀昌

談基層大學，以及余振雄談八十後社會大學時，對參與者的想像都相對比較清晰。他們都知道參與者是甚麼人，甚至預計了教授甚麼會起了甚麼作用，非常清晰。儘管李達寧說最初辦序言書室時沒有考量得太清楚，但我認為最起碼他認知了他的潛在顧客是小資產階級，是嗎？這也是種想像。所以從個人經驗來看，體制裏最大的分別就是這樣，我不知道其他同事怎樣看，但我永遠不怎麼懂去想像學生，特別在本科的教學課程。譬如說我們始終在大學聯合招生辦法（Joint University Programmes Admissions System，英文簡稱為 JUPAS）的體制內運作，所以我們能夠控制甚麼學生入讀的程度非常低，在三三四改制後，更是每況愈下。社會上面有種有趣的錯覺，總把本科生視為激進青年，這種錯覺又反過來影響到學生產生另一種錯覺，有一次有學生問我讀文化研究是不是一定要參加遊行呢？其實每次我也會說得很清楚：「不是的。」本科同學的背景絕非一兩個「激進青年」所能代表。舉例來說，曾經數次有學生問我甚麼是「泛民」，可想而知，對學生是有困難的，你實在不會知道他們是甚麼人，最清楚的僅是大部分同學都想拿個學位而已。在理解本科生的學生方面我比較幸運，因為一年級上、下學期也有我的課，但也僅止於第一年的初步認識，然後於他們三年級時再有稍微深一點的認識，但那時學生即將畢業了，認識實在不深。所以蘇耀昌說我教甚麼都行，我倒不認為這話錯，但這話的另一意思是否我教甚麼都好像不行？我舉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有一年暑假，有幾個本科生來跟我提議辦個讀書組，其實我懷疑是不是想捉弄我呢！你想讀甚麼呢？他們想讀馬克思主義，還要讀原文。好吧，就這樣決定下來，但事情不知怎地走漏了風聲，最初我只打算讓嶺大的同學參加，結果居然有些中大的同學對此感興趣，而且裏面還有幾個是文研的同學，於是我秉持著非精英的原則聲明：「歡迎參加」，但讀書會只在嶺大舉行，不會移師別處，你知道中大和嶺大相隔頗遠吧？無論如何讀書會總算開始了，有趣的是到了第三次讀書會時，所有嶺南的同學都不見人，只餘下中大的同學，所以我就這樣被脅持到中大去了。我也不知道本校的同學在想甚麼，其實他們在也沒甚麼區別，反正不到半小時都

睡著了，不過我也是該罵的，心想既然讀原典使用細讀式閱讀法（close reading）吧，於是一篇〈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讀了九小時。但中大的學生果然是精英，他們反過來還興致勃勃的聽，這就是最大的分別了。雖然這裏只分享了很少，但就我自己在嶺大的經驗而言，其實體制內不時有些有趣事情，坦白說我教了十多年書還未理解透徹，但感覺極其真實。剛才李達寧提到「不生之生」，我認為這說法準確地形容了我這十多年來在體制內的經驗，但意思可能與原來的有所出入：我理解「不生」的意思很有趣，並不是說死掉了，反而乍看之下充滿活力，在崩潰的同時膨脹成一個龐大架構，這裏可以用上很多比喻，陳清僑以往曾用「廢墟」形容大學，我則認為「不生」，指的是偽裝具有生命力、生產力，卻處於死亡過程中苟然殘存，它也令人進入同樣想死又死不了的狀態，我會這樣形容自己身處體制內這狀態的感覺。

大家相信不難理解陳清僑在那六日半生不如死的狀態下，盼望那個跟 MCS 同學上課的下午、晚上的來臨。我認為 MCS 是這樣的一個產物，就是說「不生之生」，你想在這樣一個體制找生路，起碼要進行一些嘗試。對我而言，MCS 相對比較容易想像到底會面對甚麼學生，最起碼我們的選擇權較大，甚至在開始之先便預料到想找甚麼專業的學生入讀。我在這裏教了十多年書……坦白說過程當中最有意思的是實習課，學生的確獲益不少。剛才馬國明老師指出香港像俄國革命前，我人雖未在那時空存在過，但有相近感覺。大家對體制都很不滿，於是產生了不少古靈精怪的反應，其中有許多是與對體制不滿有關的，一個比較多人使用的方法就是放棄（俗語說“hea”）。舉例說，我有一個當公務員的朋友跟我說，當今公務員的態度非常簡單，那就是在工作上，被任何人痛罵都不要緊，只要默默承受同一指責三天以上，如此指責的人便會因累而退，至少開始罵點別的，或轉移責罵的目標——這完全是放棄的態度：我怎也做不來，你罵我也沒用。另一種是「置諸死地而後生」的心態，既然面對許多事都失望和絕望，所以基本上我說甚

麼，做甚麼都沒打緊。我對近來的族群主義的閱讀就是這樣：既已絕望，那就不需理會任何原則，自創一套學說／教派出來即可。我認為「不生之生」的態度在兩者之外，身處「不生」的體制但仍然去尋找可能性，這是非常重要的，其中一種可能性就是思考面對學生與參與教育過程的人、思考對方是怎樣的人、如何與之連結。這也是體制和民間連結最基本的可能，就是你不認為「不生」的體制真正死亡，而是相信可以找出一條生路。這大概就是我的引言。

羅永生：現在便把時間交給大家了。我們有一邊是屬於「體制」，一邊是屬於「民間」的，你們對體制有甚麼不滿，現在可以作出反擊。

蘇耀昌：今天的題目是「民間辦學與體制邊緣的碩士課程」，我想第二場來自不同院校的文化研究老師都分享了他們的感受，但對於馬老師所謂要找出「共同點」，我想倒也不一定，題目反而反映了嶺大文化研究有一個對自身地位想像的烏托邦：將自己界定為體制的邊緣，以羅永生的話說就是將自己界定為嶺大的無間道，一方面認為自己在體制內快要死了，但教學不應是這樣的，所以便需要找方法能令它復活、有創造性起來，把自己與整個新自由主義底下的教育體制區別出來並作出變化，此為其一。第二是民間辦學，在他們的夢想裏，對大學體制有一盼望，就是這理想要跟民間結合，不單要結合文化研究，而且要活躍於基層民間社會。這並非是必然的，文化研究不是非得要走這條路不可，中大和港大不走不打緊，反而問題是日後他們舉行討論會要用甚麼題目呢？到底你們的理想是甚麼？這問題就留待你們自己回答，今天只是反映了嶺大文化研究系這群文研的老師和同學的盼望，既有如此盼望，到底怎樣才能實踐它？這便是值得討論的地方，由於時間所限無法再探討下去。

讓我分享一點個人經驗，近來獨立媒體與浸會大學一些老師合作，辦了一個「知

識轉移計劃」，當然這說不上偉大，計劃內容是浸大校方撥款給老師，讓他們聯絡一些民間團體共同舉辦課程予同學就讀，這做法不知是開明還是不開明，同學必須修夠學分才能畢業，老師會盡量找一些基層團體合作，同學在三、四年大學教育裏完全不食人間煙火，不知社會為何物的話，請你在畢業前去看看這個基層社會到底是甚麼樣子的。而老師們也非常有心，與基層團體商量課程設計時，都拜託每個工作坊至少有一課是教學生基層每日要面對的事，譬如開勞工課程時，我們會教如何填勞工處的申請表格；公共房屋課程時，我們會教學生申請公屋或減租的表格怎麼填；開社會福利課程時，我們就要教申請綜緩與交通津貼那極繁複的表格怎麼填，當中牽涉了甚麼考慮。老師們說即使同學唸完了三、四年的社會學社工系，對這些也僅具些概念，甚至畢業後也不曉得實際操作是怎樣的。所以這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文化研究以後如何走下去呢，尤其嶺南文化研究的老師如何將理想逐步實現呢，可以考慮舉辦多一點這樣的活動。

余振雄*：我想回應一下羅永生教授一些關於八十後的想法。關於民間，我完全認同剛才蘇耀昌關於年代想像的民間，我們也沒有單一從階級意識出發作辦學的方針，甚至「辦學」也只是一群烏合之眾談過後便去行動而已，「大學」不是一種嚴格定義下的大學，所以今天题目的「民間」並不是以相對於「體制」的意義去談，體制對我們來說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在做這件事的時候它並不在考慮之列。我們在「民間」一群人在參與運動，我們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繼續運動？要去證明運動的合理性，走錯了路回過頭再來檢視運動（思考）如何檢討，這是我們讀書、辦講座和進行討論的動力，因為我們假設進入討論的人都應該在運動裏面，他們都是些關心或者會思考運動、來自街頭或社會運動的朋友們，所以於我們來說「民間」與「體制」的考慮並不對立，而是我們基本上根本不會去考慮它。對我們來說「大學」不是一種嚴格的想像，所謂「邊緣」只是被遺忘的東西，而這種被遺忘的東西正卻在運動裏發生果效。例如以往一直看不見的「本土」，或現

在被群起攻之的「本土」，以這種考慮去想，其實以往運動裏生發過許多這種想像，為何不能持續下去等等問題。最後想作一個小小的分享，八十後社會大學裏也有人以兼職導師的身份，包括我自己在建制學校裏作有機的教學。作為有機型教學工作者，我們發現建制大學與八十後社會大學幾乎沒甚麼分別，事實是我們提出疑問，讀書，然後努力改變課程成為自己疑問的答案，例如過去的學期我教了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這不是我自己要解決的疑問嗎？當然內容程度上因為教學的原因已經作出調整，但也有很多學生表示不明白，有的卻說非常明白。其實無論辦 MCS 或 MCCC 課程也好，其實都是有心人，都是想要從中得到些甚麼的人，那些得到的東西其實很重要。所以我想回到最根本的就是我們談教學，無論是文研或八十後社會大學在建制裏面做的事，從最簡單的角度看就是在解決自己的問題。去作一個人、一個老師，處理自己的問題之餘，想想來讀書的人想要些甚麼，這是一個要處理的問題。最後，今天談建制，某程度上是有些界限（boundary），限制了我們的行動，不能兼顧太多事情，我們都在掙扎。那些有機的兼職導師，其實也為糊口，得溫飽後便可以做更多所謂「民間的事情」。這些限制某程度上一定存在，但是也可以看成為資源，以福柯（Foucault）的說法就是有了這些限制讓我們思考何謂自由，然後便去實踐自由，做不到的，便索性辭工，再去做多一點事。

吳兆華：我來這兒才知道是 MCS 十周年，MCS 裏也許有人想變成對社運影響重大的地方，我希望他們有這個機會發展。不過話說回來，我對「民間」和「體制」這兩個詞語有些意見，回顧香港歷史，早期新亞書院、聯合書院，以致於許多學院都是所謂「民間」的，因為他們都窮，又有自己的理想，但最後因為錢的問題連錢穆也放下身份，讓新亞書院進入建制，於是變成了現在的模樣，這對學生總是好事。但最近有個爭論，便是私校化，私校化偏偏就是最精英的，這點相對於美國、歐洲，那邊最頂尖的學校可能是私校，變相又走出了所謂的「建制」。這

裏建制的意義是指政府。教育機構姑勿論是自由市場或民間，民間辦學以前有創建學會，大概是五、六十年代，《明報周刊》也曾經介紹過，他們想建立一個比較全面的教學模式，倒不是完全反建制，而是希望建立一個新的教學模式，因為他們對舊的教學模式不滿。所以整個過程像是輪迴，香港由最初只有些民間學院，被吸納進建制後，又有些人想把學院變為非建制，即是私校化。一切又回到中國最古老的概念「書院」，辛辛苦苦辦書院，無非都是想要發揮影響力而已。

陳子文 Jason*：沒有 MCS 同學發言，那就讓我來說說吧！我是 Jason，二零零九年入學的。之前的分析都盡量不去處理了，反而想說說我作為學生，經歷過這課程的個人經驗。有一件事印象很深刻的事，在別の場合應該也提起過，就是 MCS 的面試了。我是由李小良博士和許寶強博士面試的，在面試結束前，小良說了一句話：「我們要改變世界！」我一生都記得，剛才提出過 MCS 是不是個烏托邦的問題，我相信是的。說說另一件事，剛剛外面碰見幾位同屆的同學，劈頭一句便問：「喂搞緊乜嘢先？」，為甚麼 MCS 的畢業生非「搞嘢」不可呢？當然我承認我的確在「搞嘢」，在關心畢業議題或者一些身份問題，所以我對劉健芝博士那句「聚是一團火，散是滿天星」很有感觸，我相信 MCS 在這過程中所發生的事，儘管不是滿天星，但幾顆也總是有的，那幾顆星如今正同在新界東北——馬寶寶社區農場裏有一位教授耕田的老師正在辦公開課，他想做的是找些人來，更新他們對於公眾文化、永續生活的概念，然後一同去做一件事，他聲稱是很「大件事」，其實卻是小事一樁，就是讓這群人拿自己的馬鈴薯出來展示，然後教人種植，去證明他所說的公眾文化是可行的，以及帶出永續的概念。今日在出門前才發現 MCS 正就明年的課程大綱進行投票，其中有一科就是“Food Crisis and Farming for The Future”，MCS 和世界的關係很難說清，讓我盡量總結：我不是很在意體制與辦學的事，反而在意這個時代大家為甚麼花這麼多時間心力「搞嘢」的問題，其實我想說的不是民間辦學，是民間求學，民間主動去生產和製造知識。本土研

究社把香港的地都列出來和政府糾纏，香港有很多事正在發生。

陳家儀 Ivy *：我是剛剛畢業的 Ivy，和 Jason 一樣都是在耕種的。我也以 MCS 畢業生的身份來發言，示範一下「邊陲」與之前的其他東西是怎樣一回事，還有希望藉此機會向 MCS 的老師致敬，因為他們教會了我這樣事情，我也想示範一下，看看畢業後這事能夠如何做。我畢業前收到了電郵通知將會開有關耕種、永續耕作的新科目，我之前也曾在馬寶寶那兒學過，另外自己的一個讀書會就是讀“Permaculture”，裏面有十二種關於可持續生活方式的概念，其中有一種是「邊緣效應」，不知道許寶強是不是看到了，所以就取了「邊緣」二字。其實「邊緣效應」是一種可持續的生活方式，繼續在體制或不是互相衝突的體制內遊走，去尋找邊緣持續發展下去，不單是十年、二十年，可能是比地球發展得更長遠的發展方式，所以「邊陲」、「邊緣」其實非常重要，大家不妨想像一下如何生活下去。我雖然已經畢業，但我還有一個“Action Research”在進行中，許寶強知道我在做甚麼，這個研究要進行兩年，但我在最後一個學期才開始，而我是「真的做」的，不是假戲真做，是真的在進行中。我去尋找食物的來源、研究食物的供應、耕田、向土地學習、向植物學習等。本身我自己也是老師，但在教的同時也在不停地學習，其實教與學的關係便是這樣，我就在教與學的同時發現到教學這活動的發生，我希望能以行為來答謝教了我兩年的 MCS 老師，你們教了我這麼多，我現在終於做到這件事了。

我在讀 MCS 之前，填表格的功夫很厲害，我集齊所有資料填好表格，表格亦從不會被退回。我填表格的本領很高，但問題是我不懂得「邊陲」，唸完 MCS 我便懂得「邊緣效應」或諸如似類，耕種是不用填表格的，在農田、農場見到的只是田地，農夫原來從未填過表格，所以我又學到了新的東西。在座都應該是 MCS 或對 MCS 有興趣的人，我們希望各位知道讀 MCS 能學到一些事，不過可能尚未

被發現或者還未做“Action Research”。多謝大家。

羅永生：多謝同學的發言，相信接下來還有很多同學想發言，所以請同學盡量精簡。

胡世君 Kenneth*：我是 Kenneth，提到種馬鈴薯，我之前在澳洲當過半年農夫，有機會可以交流一下。但我想說的也是「邊緣」二字，因為我不止是 MCS 的學生，也曾在中大讀過性別研究，都是些比較邊緣的科目。我在專上學院教書，教的科目是「全人發展」，朋友常問那到底是教甚麼？我常因此而苦惱，唯有答：「甚麼也教一點，類似通識吧」。在教學過程中遭遇了一些問題，其一是由於身處於專上學院中，當我嘗試將自己所學如文化、社會意識乃至於性別平等的概念放進課程時，便發覺學生最想學好的是設計或商業，「全人發展」是終極次科，而英文和普通話則是次科。我面對著一個難題就是身處於建制、一個龐大的體制內，資源不是沒有的，但有資源的同時高層也有著許多想法。我們必須回應僱主，於我們故之然是要教那些溝通技巧、團隊精神，但當真的把所學的元素融入課程時，便發覺真的很困難。其二是像剛才提到的通識，現在我教的科目叫國際視野（Global Vision），在講解功課時，學生會靈機一觸的問：「這不就是通識嗎？」我忙著說兩者間存在分別，接下來會遭遇到兩種情況：一是大部分學生都不喜歡通識，二是當他們的思考投入進去時，要將其抽出來十分困難，因為學生會誤以為將中學在通識科取分的概念／邏輯應用在這科國際視野中便可。我與我的同事不斷努力地告之其分別，該如何做事，但是如何做與這龐大的機構裏給予的職業訓練很有關係，校方在課程內容方面又想要有國際視野，而我又想將文化研究的事融進去提高學生對社會的關注、對文化的理解、關心、分析，諸如似類的，卻束手無策，這就是我所面對的處境。

蕭超杰*：想回應一下 Jason，其實是不是畢業後就沒有將東西帶走或傳承下去呢？其實是有的，我自己亦有參與不少社會運動，當中亦會思考在評估形勢分析上應用的一些理論。在機緣巧合之下，我們有些組在參與運動後，可以到不同院校進行分享以及討論自己的經驗，所以事情並不是沒有發生，只是在於數量多少、發生的程度有多大，你會不會去做這事。很多同學可能在參加運動後不敢或認為自己不懂得分享，其實我也不知道該怎樣說，亦不知道同學帶有些甚麼疑問，所以在分享過程中帶給同學這訊息是重要的。其實正正是因為我覺得參與民間團體的過程中有所不足，所以才走進體制，然後將體制學到的知識帶出去用，所以民間團體和體制並不是對立，相反有時需要兩者的結合，我認為這點非常重要。我對於面試時被問及你有甚麼問題需要解決的印象很深，亦嘗試在讀書的時候解決問題，但問題一直解決不了，因為它一直在發展中。在讀 MCS 的時候問題在變化，所以處理問題的方法也要一直在變。我想 MCS 課程並非畢業後便等於完結，而是如何將學到的帶入生活、社會介入、社會分析、傳達給身邊的人，對於我們民間和體制結合後該如何進一步發展，確實需要更多的思考空間。

許寶強：我只想補充一點，我們今次辦的研討會題目為「民間辦學與體制邊緣」，所以剛才的討論一直集中在民間辦學與體制邊緣，其實還有一個大題目——「遊走於體制內外——文化研究與成人教育的回顧與前瞻」，所以研討的應該是文化研究與教育的關係。關於教育，我想回應吳俊雄博士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Craftsmanship”，其實就是解決自己的問題，體制也好，民間大學也好，都在解決自己的問題，尤其是在教育方面。這個問題有其特別性，若然是其他工匠（craftsman），不論工匠也好或其他諸如此類的，你需要處理自己的對象，包括物料或樹木等，若我們跟他們學習耕種，會從泥土、種籽等開始學習，而教育呢？則是從你的教育對象學習。教育的特殊性就在於你同時是在解決自己和對象的問題。作為一個工匠，我們認為生活沒有意義，六天半沒有意義，所以我們去尋找

意義，這就是作為一個工匠的訴求。我們要去專注地去解決一些事情，而教育裏的特殊性在於你必須向你的教育對象學習，對象即是學生。葉蔭聰所說的想像其實就是認識與了解，兩者的配合導致民間也好，體制也好，不可能只解決自己的問題而不解決學生的問題。如果是這樣的話，並沒有辦法處理教育。我在這裏是想補充一下我們的大題目，八月三十一日的研討會可以繼續探討。

陳清僑：我再重申一次我並不認為那六天半沒有意義，其實那六天半很有意義，但不開心這倒是真的。那六天半很不開心，所以剩下的半天更顯得有意義和開心。

我很同意許寶強對教育的說法，教育當然是教人而不是教知識，這是我們都同意的。廢墟的說法不是我說的，而是由大學學者 Bill Readings 提出，有具體的特殊意義。我認為直至現在也仍然適用，特別在新自由主義的環球狀況下，它談教育，特別談到指涉大學，即是高等教育方面，指英文大寫的「大學」與大「文化」已不再存在，所以馬國明那個紀念碑（monument），無論是帶有正能量還是毀滅性的也不存在，形成本地廢墟。我那篇〈廢墟中建構文化研究〉的文章其實也用上了三四年時間，而在那三四年間就建構了文化研究，所以也算是個階段性的象徵。

羅永生：還有沒有最後的意見？在結束討論之前，我也有話想說。今天的討論很豐富，挑戰我一直想挑戰外與內的劃分。剛才說沒有 Capital C 大寫的文化，我想我們可以回顧一下這十多年自有文化研究以來，我們對於甚麼是理論、甚麼是實踐之間的關係，都有了重新的思考。若宏觀一點，以文本、政治經濟學的角度談文化研究，它之所以被新自由主義推了上來，變成大寫文化時，文化研究的焦點其實是在於文化的流通與消費。不過流通與消費我們又得重新定義，甚麼是消費

呢？消費原來也是一種生產，那我們到底是不是在與之抗衡呢？我們有很多困擾。今天有一個部分談到我們是不是處於十九世紀的狀態呢？我認為之前的討論迴避了的問題，以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說就是做了十多年還在處理怎樣流通、怎樣消費，然後將其轉化為動力的話，我們也不是很直接面對知識生產的問題，以及去生產出一種宏觀的視野。究竟我們視「體制」為純粹的「體制」，我們去利用它、吸取當中的資源，還是怎樣呢？

因為當我們面對的大挑戰不再是清晰的強權時，我們要反抗它，問題很多時候反而是出現在「民間」，出現在我們的公共空間中，學院作為公共空間的中流砥柱，必須重新思考如何建構出一個逐漸散失、崩壞的公共文化。在這個前提底下，無論是在學院裏領薪的力量，或學院外所謂的邊緣力量都在面對共同問題，我認為今時今天看文化研究若沒有這遠景的話，是一個很大的失敗。

*MCSian，嶺大文化研究碩士畢業生或學生